

李副总理听取全国商业局长座谈会汇报时指出 根据社会需要大力发展合作商业服务业 这些单位的职工政治上应当和国营职工一视同仁；基本工资应相当于国营职工的水平，工资奖励应当更灵活一些；应允许某些个体劳动者在当地工商行政部门管理下走街串巷

保证夏收作物责任制奖励兑现 全县已有十个公社召开奖励兑现大会，发了奖金

新华社成都八月八日电 中共四川省什邡县委纠正农村中少数核算单位不履行夏收作物生产奖励合同的偏向，保证合同兑现，使党的政策得到群众的信任。

今年，什邡县有一千多个核算单位、二千八百多个作业组实行了“定产量、定工分、定成本、超产奖、欠产赔”的责任制，由核算单位与作业组签订了合同。生产责任制的建立，调动了社员积极性，夺得了今年夏收作物丰收。丰收后，绝大部分作业组都完成和超额完成了“三定”任务，核算单位决定按合同办事，予以适当奖励。但也有少数核算单位对于超产过多或未达到产量要求的作业组犹疑不决，甚至打算把合同“一风吹”，群众意见很大。什邡县委调查了这些准备毁掉合同的生产队和作业组，发现这些队、组，有的是干部或干部亲属所在的队、组，搞得不好减了产；有的是干部担心奖金发多了以后不好办；还有的是指标订得过高而没有达到，执行合同遇到了困难，等等。县委经过讨论，认为贯彻三中全会精神，落实按劳分配政策，是今年夏季夺得农业丰收的重要原因，必须说话算数，奖励兑现，才能取信于民，进一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为此，县委在各种会议上反复强调执行政策、奖励兑现的重要性，对于执行合同出现的问题，县委派干部到基层调查，提出解决的具体办法。

根据县委统一部署，各公社党委召开执行合同碰到困难的大队干部会，生产队长、作业组长会，讲明实行生产责任制对落实按劳分配政策的意义，帮助干部认识履行合同的严肃性。然后由公社干部同大队干部一起，深入到队、组，听取意见，针对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保证合同兑现。这些措施是：一，凡因干部所在组减了产、不能兑现合同的，要做好干部的思想工作，促使干部带头执行政策，保证奖励兑现。二，对于担心奖金多了的干部，主要向他们讲清这是多劳多得的体现，奖金只是超过定产部分中的少部分，集体得的还是多数，解除干部顾虑，落实奖励合同。三，对于合同指标确实过高的，则经过核算单位社员大会讨论，或按前三年平均产量为基数，或以各作业组平均产量为基数，适当调整指标，使奖励也能兑现。经过上述工作，原打算把合同“吹”了的生产队、作业组都坚决按合同办事。目前已有十个公社召开了夏收作物生产责任制奖励兑现大会，发奖金十二万多元。

新华社北京八月八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最近在听取全国商业局长座谈会汇报时指出，合作商店和合作修理服务单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它作为国营商业服务业的有力助手，在活跃城乡市场，供应人民需要，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等方面，都有积极的作用。它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具有经营灵活、起早贪晚、方便群众等特点。

李先念同志说，这种商业形式，不仅在目前是需要的，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也是不可缺少的。各地要根据社会需要和当地实际情况，大力发展并把它办好。要在城市和农村，开办若干合作商店、合作饭店、合作旅社、合作运输以及各种修理服务合作小组。这对繁荣社会主义市场，服务人民生活，广开就业门路，安置待业青年，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李先念同志指出，合作商店和合作修理服务单位的职工，是社会主义商业职工队伍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政治上对他们应当和国营商业服务业职工一视同仁。合作商店和合作修理服务单位职工的基本工资，应当相当于国营商业服务业职工的工资水平，工资奖励应当更灵活一些。经营好的单位，职工的工资收入可以高于国营商业服务业职工的工资。他们的福利待遇，也可以高于国营商业服务业。当然，经营得差一些的，也可以低一些。

李先念同志说，合作商业和合作修理服务单位要有一定的公积金，用于营业设施的维修、改造、添置和扩建。要有一定的公益金，用于职工福利、劳保、救济和退休、退体的需要。这些资金要按规定留足，决不允许随意抽调，不许以任何借口，挪作它用，以保证合作商店、合作修理服务单位业务的发展

和职工的福利开支。前些年，这方面问题不少，今后不能再这样干了。

关于合作商店和合作修理服务单位的货源，李先念同志说，主要由国营商业供应。同时，应当允许他们同工厂直接挂钩，或者同工厂建立固定的经销、代销关系。合作商店和合作修理服务单位在经营方式、企业管理、服务态度、服务质量等方面，要同国营商业服务业互相学习，互相竞赛，互相促进，共同提高。

李先念同志还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在以国营商业为主体的情况下，不但要发展集体所有制商业服务业，而且应当允许某些个体劳动者，在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下，走街串巷，从事理发、修鞋、磨刀、修伞、修家具、卖小吃等劳务活动，这对补充商业网点的不足，安排城市就业，方便群众生活，是有益处的。

摆脱越南当局的政治迫害 黄文欢同志最近到达北京

黄文欢同志是越南共产党的元老、胡志明主席的亲密战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越南革命和越中友谊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八月八日电 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黄文欢，摆脱越南当局的政治迫害，已于最近到达北京。黄文欢同志离开越南辗转来到北京后，受到中国有关方面的热情接待。由于年老体弱，他来到北京后一直在进行疗养。

七十四岁的黄文欢同志是越南共产党的元老、胡志明主席的亲密战友。他于一九四五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并任越北解放区党委书记。一九四五年越南八月革命胜利后，曾任国防部副部长。一九五〇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七年四月任越南首任驻华大使。一九五六年八月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从一九五八年起至今，一直担任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在越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黎笋集团排挤出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

在越南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黄文欢同志在胡志明主席的直接领导下，为越南革命和越中友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胡志明主席逝世后，他继承胡主席的遗志，竭力维护越南人民的革命胜利成果，维护越南的真正的独立自主，维护越中友谊，因此遭到了黎笋集团的打击和迫害。



这是黄文欢同志在北京的近照。新华社记者摄

充分发扬民主 接受群众监督

大庆党委发扬好传统组织基层检查团全面检查领导机关的工作

本报讯 记者陈显发报道：最近，大庆党委组织基层检查团对大庆领导机关的工作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真正发扬民主，实现广大群众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批评和监督。

大庆石油会战初期，会战工委经常组织基层检查团检查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的工作，出现了领导干部不搞特殊化，领导机关坚持面向基层，干部与工人不分职位高低，同甘共苦，艰苦创业动人景象。今天，继承和发扬这一好传统，对促进工作重点转移很有好处。

基层检查团由基层单

位的领导干部、工作人员、老工人、模范标兵及家属的代表组成。他们分作十个小组按部门进行对口检查。受到检查的部门领导干部主动向代表们汇报本部门工作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接受代表们的查询。代表们是代表广大群众行使民主权利，实行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监督的，因而在检查中边听、边看、边问，十分严肃认真。在检查中，

对大庆教育战线实行人事和财经的统一管理，有利于提高教育质量，为现代化建设培养更多的人。大庆机关各部门连日来纷纷根据基层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认真进行了研究讨论。大庆政治部的干部对于基层代表向他们提出的五个方面共八十一条意见都一一作了认真讨论，制订了改进措施。他们还提出，基层代表由于时间短

和其它原因，有些意见可能没全部讲出来，应该借此股东风，发动广大机关干部经常主动诚恳地征求群众意见，努力把新形势下政治工作做得更好。大庆生产办公室的干部把基层检查团所提出的问题归纳整理，凡属可以立即解决的，都落实到处、室、落实到人头，限期整改；暂时不能解决的，切实做好安排，列入工作计划或规划，逐步加以解决；涉及全局性的问题，提请大庆党委共同研究解决。目前，机关其它各部门正在进一步落实和改进基层代表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我国又一座大型化肥厂基本建成 洞庭氮肥厂投料试车一次成功

据新华社长沙八月八日电 我国从国外引进设备的一座大型化肥厂——洞庭氮肥厂基本建成，最近投料试车一次成功，进入试生产阶段。目前，一包包优质尿素源源不断地运往各地，支援农业生产。

参加这项工程建设的干部、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虚心学习外国先进技术，认真吸取国内已建成投产的同类工程建设的经验，克服许多困难，加快了工程进度，确保了工程质量。与此同时，工厂狠抓了生产准备工作，做到了投料试车一次成功。从投油到出尿素只用了十四天，在我国已投入生产的同类大型化肥装置中时间是最短的。经过考核，这个厂的生产能力、产品质量都达到了设计要求。

洞庭氮肥厂的合成氨装置和尿素装置是从美国和新三引进的；配套设施是由我国自行设计、制造和施工安装的。

据新华社长沙八月八日电 我国从国外引进设备的一座大型化肥厂——洞庭氮肥厂基本建成，最近投料试车一次成功，进入试生产阶段。目前，一包包优质尿素源源不断地运往各地，支援农业生产。

参加这项工程建设的干部、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虚心学习外国先进技术，认真吸取国内已建成投产的同类工程建设的经验，克服许多困难，加快了工程进度，确保了工程质量。与此同时，工厂狠抓了生产准备工作，做到了投料试车一次成功。从投油到出尿素只用了十四天，在我国已投入生产的同类大型化肥装置中时间是最短的。经过考核，这个厂的生产能力、产品质量都达到了设计要求。

洞庭氮肥厂的合成氨装置和尿素装置是从美国和新三引进的；配套设施是由我国自行设计、制造和施工安装的。

怎样让农民尽快富裕起来 ——上海郊区二十个生产大队的调查对比

上海郊区十个县，共有二百零四个公社，二千八百多个生产大队，二万五千多个生产队。一九七八年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分配平均每人二百三十元，有三百一十二个生产队超过三百元。但发展不平衡，有一千四百八十五个生产队平均每人分配不到二百二十元。

怎样使农民尽快富裕起来？市农业办公室在每个县选择两个以种植粮棉为主、收入差别较大的生产大队，会同县委一起作了调查对比。这二十个大队的土地与劳动力比例差不多，平均每个劳动力都占两亩左右；粮棉种植比例大致相等。但各队的经济状况有三个差别：一是社员分配。高的队每人平均达三百二十五元，低的队仅一百九十元。二是集体家底。高的队每个劳动力拥有固定资产五百六十元，低的队仅二百九十元。三是对国家的贡献。每个劳动力向国家提供的商品粮，高的队从一九六六年的一百五十六斤增加到九百八十斤，低的队反而由五百八十二斤下降到四百七十二斤；提供的棉花、油料、生猪也相差三分之一左右。这些大队的基本条件差不多，为什么收入、家底、贡献差别多？主要是他们之间农业劳动生产率高低不一样，工副业发展快慢不一样，领导水平和管理水平不一样。

先决条件在于大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这二十个大队中，农业劳动生产率高的十个队，去年平均每个劳动力生产粮食三千一百六十斤，比低的队高百分之三十三；棉花一万四千一百四十斤，比低的队高百分之三十三；油菜籽一万四千三百斤，比低的队高百分之二十三。土地是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只有集中精力首先把农业搞上去，才能为四个现代化多作贡献，才能使农民的收入有较大的增加，生活得到不断改善。这十个生产水平高的队，坚持因地制宜，发扬

内容提要：上海市农业办公室会同郊区十个县，选择十个收入高和十个收入低的大队作了对比调查。这些大队的土地与劳动力比例差不多，粮棉种植比例也大致相仿。但是有三个“差得多”：社员分配水平差得多，集体家底差得多，对国家的贡献也差得多。为什么生产条件基本相同，而社员分配、集体积累等却很悬殊？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差距：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工副业发展的差距，管理水平的差距。要使农民尽快富裕起来，这十个收入高的队的实践经验是：一、大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集中精力打好农业翻身仗。突出抓两条：一条是大搞治水改土，增积有机肥料，改善生产条件，为高产稳产打好基础；一条是狠抓科学种田，在茬口安排、选用良种、科学管理等方面下功夫。二、积极搞好工副业生产。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在抓好农业生产的同时，因地制宜，广开门路，积极发展畜禽饲养业、水产养殖业、种植业、手工业等副业生产，办好社队企业。三、提高领导水平和管理水平。收入高的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领导班子稳定团结，有创业思想，有发展规划，懂生产，会当家，管理水平高。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大打农业翻身仗，主要抓两条：一是大搞治水改土，增积有机肥料，改善生产条件，把农田建成能排能灌、有机肥足、熟土层深的丰产田，为高产稳产打好基础；二是狠抓科学种田，在茬口安排、选用良种、科学管理等方面下功夫，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他们去年平均每亩土地产值二百六十三元，比低的队高百分之三十三；每个劳动力创造农业产值七百五十九元，创造纯收入五百四十一元，比低的队分别高百分之五十四和六十八，即多收入二百二十元，扣除公积累后，平均每人可多分八十元。这就是说，去年他们比低的队社员多收入的一百三十五元中，有八十元（占百分之六十八）是来自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宝山县海星大队和芜家大队的调查对比，更具体说明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是农民不能尽快富裕起来的前提条件。这两个大队的土地与劳动力比例，粮棉种植比例都基本相同。海星大队一千五百一十二亩耕地，百分之六十九是潮沙地，土壤板结，熟土层浅，通风透气性差。他们抓住改良土壤这个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环节，增积有机肥料，每亩上猪羊粪和草堆泥一百二十担。去年亩产粮食二千六百三十七斤，皮棉一百八十斤，油菜籽四百二十六斤，每个农业劳动力创造纯收入七百五十九元，由农业提供的分配金额，按农业人口平均，每人达二百四十元。而芜家大队，原来的土壤条件比海星大队好，由于农业没有抓好，肥料积得少，每亩只施有机肥二十担，产量上得很慢。去年亩产粮食一千六百零二斤，皮棉一百三十斤，油菜籽二百六十八斤，每个农业劳动力创造纯收入三百七十六元，从农业收入中提取的分配，平均每人只有一百四十元。

李熙峰听了宋万钧的介绍，一致认为，象高为奇这样的在成长时期，需要继续加强们少走弯路。他逐渐发现们门功课虽然都很好，但是酷对地对平面几何的学习有些天，高为奇向李熙峰老师请不等式的证明题，李熙峰告个公式的证明有很多种，而闵柯鹤教授的证明方法很简

在我们党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有为数很少的干部跟着林彪、“四人帮”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这些干部经过揭批林彪、“四人帮”的伟大斗争，总结起来是个什么情况呢？可以这样说：大都说了问题，分清了是非，提高了觉悟，得到了大家的谅解。不少同志解脱之后，服从组织安排，在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立新功，补旧过，重新取得了党和群众的信任。但是，确有些犯错误的干部态度不好，不是努力改正错误，而是相反，一有机会就不认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加快落实政策的步伐，强调发扬民主，加强法制，安定团结地发展四化建设，有的人就以有机可乘，把自己跟着林彪、“四人帮”犯错误而受必要的审查，同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冤案、假案、错案等同起来，混为一谈。他们或者颠倒是非、无理取闹，把自己打扮成所谓新的冤案、假案、错案的受害者；或者口口声声讲实事求是，而他们所要的“实事求是”，就是对自己的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能推则推，拒不认错，有的甚至打击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积极分子，扬言“现在不是我给你们说清楚的时候了，是要你们给我说清楚”，等等，企图从根本上否定揭批查运动。

处理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冤、假、错案，同处理跟着林彪、“四人帮”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干部的问题，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问题的性质不同，处理的方针也不同。前者是把它纠正过来，后者是区别不同情况，进行教育和挽救，作出正确结论和恰当处理。

“四人帮”是一伙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是我们党和人民的凶恶的敌人。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发动群众，揭露和清查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彻底肃清“四人帮”在各方面的流毒和影响，这是完全必要的，十分正确的。难道“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种种倒行逆施不应该揭批，不应该查清吗？整个揭批查运动，党的方针政策是既坚定又慎重的。我们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我们把受“四人帮”影响说了错误的错事，同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严格区别开来；把参与某些篡党夺权阴谋活动但是尚属受人利用，犯政治错误的的人，同参与“四

犯了错误切不可讳疾忌医

《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

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骨干分子严格区别开来；在骨干分子当中，又把那些愿意悔改，积极揭发“四人帮”的罪行，与“四人帮”划清界限的人，同继续顽抗的死硬分子严格区别开来。我们对于那些究竟属于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一时还划不清楚的，总是先作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对犯了错误的干部作组织处理时，凡是可轻可重的，宁可从轻。人们看得很清楚，现在的这些做法，完全恢复了我们的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代所确立的方针、政策和好的传统，坚决摒弃了林彪、“四人帮”那一套栽赃诬陷、刑讯逼供、无情打击、一棍子打死法西斯手段。揭批查运动对于粉碎资产阶级帮派体系，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现全国安定团结，推动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为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起到的巨大作用，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有的人把党和群众帮助自己同林彪、“四人帮”划清界限看作是“打击”，是毫无道理的对揭发批评了自己错误的同志记仇，寻机进行报复，这是党的纪律绝对不能允许的。

有人说，对跟着林彪、“四人帮”犯错误的干部要实事求是。这话当然是对的。实事求是首先是实事，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是什么问题就说什么问题，有多大错误就是多大错误，既不能把三分说成七分，也不能把七分说成三分。现在的问题是，有的人分明有错误却不正视错误，想方设法回避、掩盖错误，原来在并承认了的错误又要推翻，原属恰当并同意了的审查结论又要修改，实际上他要人家对他“实事求是”，就是要人家帮他抹煞事实。这怎么行呢！我们党历来对待犯错误干部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个方针对于跟着林彪、“四人帮”犯了这样那样错误的干部同样适用。贯彻执行这一方针，把犯错误干部本身来说，就要承认自己有病，治病不能不承认，或者把大病说成小病，讳疾忌医，那又怎么能治好病呢！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这一段历史，不是普普通通

的历史，在这场严重斗争中犯了错误，那是绝对不应该也不能够抹煞的。如果一个人真的珍惜过去为党和人民做过好事的历史，今后还决心为党为人民多做工作，那就应当真正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正视自己的问题，深刻吸取教训。

有的人在得到组织上的从宽处理以后，竟然责问过去为什么要批判他，应当给他说清楚。可以明确回答这个问题，这叫做：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这是我们党对犯错误干部的一贯政策，是一个完整的政策。所谓从严，是要从原则的高度对错误作出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进行严肃认真的批评教育；从严的目的是为了促使犯错误的人猛省，接受教训，痛改前非。使犯错误的入弄清思想，分清是非，团结这些同志一起工作就有共同巩固的思想基础，也就为处理从宽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以为批判从严就不能从宽处理，或者用处理从宽来否定批判从严，都是不对的。清查中只要把自己的问题检查交代清楚了，有改正错误的表现，得到群众的谅解，组织上按照党的政策，从宽处理或免于处分，这是对犯错误干部的爱护和信任，怎么可以因为没有给你处分就认为自己没有问题，就要否定以前应该受到的批判和教育呢！

当前少数犯错误干部想推倒错误、不认错的情况并不一样。极个别的人，从粉碎“四人帮”以来一直坚持错误立场，对党组织和群众的的教育挽救，对揭批查始终抱着抵触情绪。除此而外，应该说主要还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有的是对揭批林彪、“四人帮”这场伟大斗争以及自己所犯的错误认识不足。有的是没有接受教训，旧病复发；过去错误“离开党委闹革命”成了震源，现在又无理取闹，以为闹可以解决问题；过去以风为准，看风使舵，成了风派，现在又闻风而动，借雷声政策推翻自己的错误。还有的是私心杂念太重，对于自己的错误，或者可以说可以，写成文字就不干；或者怕承

认错误以后，对自己的前途有影响。不管哪种情况，犯了错误，总是以认错改错为好。如前所说，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并不因为你你不承认就不存在了。我们从衷地希望跟着林彪、“四人帮”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干部，真正能够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正视自己的错误，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的帮助教育，改正错误。不要讳疾忌医，采取不承认主义。一个人从犯了错误到认识错误以至改正错误，要有一个过程，认识上有一些反复往往是难免的，所以我们常常说要一分为二，要耐心等待犯错误的干部觉悟。但这决不是说，对待错误问题可以采取不严肃的、不负责任的态度。一會兒承认一會兒推翻，翻来覆去就认账，一股风刮来了就推掉，这样的反反复复，对革命事业和对犯错误干部本人都有坏处。

各级领导要加强对犯错误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要认真听取他们的要求和意见，合理的就采纳，不合理的要说服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态度。各单位在抓紧对犯错误干部的结论定案工作的同时，更要针对他们的思想实际，把工作做深、做细。同时，要十分注意掌握党的政策，防止只强调问题的一个方面，忽视另一个方面。比如，不能一谈组织处理从宽，就认为犯错误干部应该作结论的都不作了。个别单位如果确有结论偏严、处理偏重的问题，应当按照党的政策积极纠正。由于这方面原因，犯错误干部通过组织提出申诉是可以的，不能说是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抓住组织上工作中的一点问题，要借机把自己确实存在的错误全部推掉，甚至把错误的也说是正确的，这是我们不能允许的。

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国各族人民，全党和全军的同志，都在一心奔四化。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干部，应该和大家采取同一个步调。其中多数已经这样做了。少数人不仅自己在错误中继续，而且到领导同志和别的人，这是很错误的，应该及早改变过来。端正态度，振作精神，积极投身到四化建设中，将功补过，同全国人民和大军、全军同志采取同一个步调，这才是犯过错误的干部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

（原载八月五日《解放军报》）

切实做好婴幼儿保健教育工作

方毅同志在托幼工作会议上作重要讲话，要求各级领导和社会各方面重视

托幼工作，提高保教工作者社会地位，培养又红又专保教队伍，发展托幼事业

新华社北京八月八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八月七日上午就当前做好婴幼儿保健和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以及应当提高保教工作者社会地位，培养一支又红又专的保教队伍等问题，作了重要讲话。

他在教育部、卫生部、

劳动总局、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联合召开的托幼工作会议上讲话说，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是关键、教育是基础，婴幼儿的教育又是教育工作的基础。托幼工作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各级领导和社会各方面应该给予这项事业以应有的重视。

方毅同志在谈到托幼工作的重要意义时还说，托幼工作是一门科学。国内外教育学家、心理学家、儿童保健专家认为，婴幼儿时期是一个人的身体和智力发展的关键时期。有些学者还认为，从出生到七周岁，是婴幼儿智力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如果从小就对婴幼儿进行合乎

科学规律的保育和教育，婴幼儿将会发育得更健康、更聪明，学的知识也更多。

方毅同志指出，目前，我们还有一些同志不重视托幼工作，把它看做是“婆婆妈妈”的一件小事，有的甚至把抓托幼工作和抓生产对立起来。这都是错误的。方毅同志强调说，儿童一代是否具有健康的体魄、良好的品德和发达的智力，直接关系到民族的兴旺和国家的前途。在孩子身上舍得花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绝不只是消费，而是一项建设事业，是为未来投资，是一项崇高的事业。做好婴幼儿的保育教育工作，不仅是百年树人的大事，而且对解决当前不少职工和科技人员要求入托孩子，以集中精力从事四化的愿望，也是十分迫切和重要的。

在谈到应该尊重保教

人员时，方毅同志说，解放以来，我们已涌现出不少全心全意为托幼事业贡献生命的保教工作者。他们的道德品质是高尚的，他们的劳动是辛勤的，应该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逐步解决他们的经济待遇问题。对他们的先进事迹应当大力表扬。要重视评选先进的保教工作者。对工作特别出色的教员、保育员，应给予特级教师、特级保育员的光荣称号。他说，旧社会人们看不起教育小孩的说什么“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我们要改变这种旧观念。应当提高保教工作者的社会地位，使他们受到社会的尊敬和尊重。对于“四人帮”横行时期受到迫害至今尚未平反的保教工作者，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方毅同志还说，托幼工作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由于经费问题，要照顾现实，积极争取，能解决的问题尽量解决。被其他单位占用了的托儿所、幼儿园的房屋，要商量退出来。要注意逐步培养一支又红又专的保教工作队伍，使我们的托幼事业逐步发展起来。

《（上接第一版）

事实证明，在抓好农

业生产的同时，再插上工业和副业两只翅膀，集体经济就能腾飞起来，农民生活就能日益富裕起来。

关键的一着要提高领导水平和管理水平

二十个大队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和工副业发展的快慢之所以如此悬殊，关键在于领导班子。收入高的队，班子团结团结，有创业思想，有发展规划，懂生产，会当家，管理水水平高。收入低的队，领导班子中有的闹派性，不团结；有的变动多，不稳定；有的青年多，没经验。管理水水平不高，经济效益就不一样。青浦县林家草大队去年亩产粮食超三纲，皮棉过双百，每个劳动力创造纯收入七百九十六元，社员分配平均每人三百二十三元。而芦花大队就低得多，亩产粮食一千四百斤，皮棉一百八十斤，每个劳力创造纯收入仅三百七十九元，社员分配一百五十元，不到林家草大队一半。原因就在林家草大队的领导班子，在指挥农业生产上，还趋利避害，会动脑筋，肯下功夫。他们把全大队五十四块高低不平的圩田，改造成南北一个向、大小一个样的六块大圩田，大块建成四沟配套的吨粮田。搞副业生产也很精明，根据本队的条件，先从投资少、收效快的项目开始，抓了杞柳的种植、编织，逐步把机

耕路、圩堤、沟渠、河坝、宅前宅后等十边地都种上杞柳和竹木。五十多亩水面全部养鱼，种上水生作物。还根据社员体力强弱、技术高低，因人制宜地建立了长年固定和临时性的各种专业队。如把老年辅助劳力组成一个绿化队，负责管理十多万棵柳，每株一年增收一元，平均每个社员一年就可得益一百多元。每年修下的树枝用于烧窑制砖，一年又可收益七千多元。社员高兴地说，队里的树是“摇钱树”，是“土地银行”。而芦花大队，十边地荒芜，水面没有很好利用，猪、禽的饲养管理也很差，连年赔钱。从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八年，仅养猪一项平均每年就亏六千一百多元。

上海市新龙大队和跃农大队也是一个生动的对比。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八年，两个大队新增劳力同是二百七十多个。新龙大队增加的劳力投放到队办工业和发展养猪、养鸡、养鸭、养鱼、种蘑菇、种杞柳上，还根据靠近集镇的特点，在农闲时间组织社员搞短途运输等劳务，去年收入六万七千元，仅这一项平均每人可增加收入七十九元。跃农大队则相反，担心搞多种经营亏本，坐等上级安排工业生产项目，结果大批劳力没有出路，“一千多人都是围着农业这口锅吃饭”，

社员平均每人收入比新龙大队低百分之七十五。

这次调查，引起了郊区农村干部社员的大兴趣和反响。宝山县海星大队的群众说：“我们与县里城镇工人比，收入差不多，算是比较富裕了，就是农忙辛苦一点，对于区工人比，还是短褲穿袜子——脱一脱。”对富裕的标准，议论也较多。他们认为，达到县里城镇工人的收入水平，是第一步；接近市区工人的收入水平，是第二步。用这两个标准来衡量，十个收入高的队每个劳力年收入五百一十三元，和郊区城镇工人平均月工资四十五元左右基本相平。工人有奖金和福利，农民有自留地、家庭副业的收入，而且在农村开支小，生活已不低于城镇工人了。在这些收入高的队里，“集体经济有基础，社会主义有奔头”，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比较坚定，不安心农业的现象已很少见了。

从二十个大队的调查中看到，上海郊区虽有人多地少等不利因素，但也有城市支援力量大和自然条件好等有利条件，发展社队工业、畜牧水产、外贸出口、食用菌、林木花草和手工编织等的潜力是很大的。这就是说，只要全党重视，政策对头，措施得当，领导有力，在提高农业生产的同时，加快发展工业、副业生产，使农民尽快地富裕起来，是完全可能的。

上海市革委会农业办公室调查组



快乐的暑假

假期阅读室，供中小学生在暑假期间阅读，安徽省嘉山县图书馆及时举办

上海市中学生生物夏令营的同学在天目山捕捉昆虫，培养对生物科学的兴趣。

新华社记者 张刘仁摄

北京市教育局和北京市总工会在暑假期间，组织部分中小学教师和校外辅导员到避暑胜地北戴河作短期休养。

新华社记者 喻惠如摄

